汗亦部族首長，其間的差距是部族之大小不同而已，二者地位相等，故皇帝（可汗）行再生禮，夷胥堇亦行再生禮，皇帝（可汗）行柴册禮，夷胥堇亦行柴册禮，遼史本紀是皇帝（可汗）的家譜，對於皇帝的行再生禮、柴册禮記載頗詳，於夷胥堇的記事則缺如，這，或許與這的演化有關係。因此，當部律休哥行再生禮時，是皇帝「命……行再生禮」，彼雖然不是夷胥堇，亦照樣的受命享有特殊的恩惠。劉銘恕謂「命入內神帳云云，恩寵特賜，而一般國王行再生禮者，終不啻若是也」是又以一概全矣。

註一：Wittfogel, Karl A. and Feng Chia-shi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P.27A "This seems to be a survival of an old Inner Asiatic practice. when a Turkish Khaghan was invested, he was first carried on a left blanket which the bearers turned around nine times. After this, he mounted a horse and was choked so severely he almost suffocated, while he was still dizzy, his followers asked how long he expected to be khaghan. His reply determined the longth of his rule.(Chou 50.4b.)" 據周書卷五十突厥傳云：其王初立，近侍重臣昇輿之以巡，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頭，便繞不至絕然後靜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

註二：中國文化研究彙刊卷六「遼代帝后之再生儀」，文中凡提及劉銘恕者即指此文。

註三：民國五十三年中國文化學院出版。該書共分三部分，即：契丹族的勃興與遼國的興亡、遼國的社會與文化、征服王朝遼是胡族國家。

註四：大陸雜誌卷四第二期「契丹民族的再生禮」文中凡提及林瑞翰者即指本文而言。

註五：遼史卷五十二有「皇帝受册儀」，儀文尾云：「太平元年行此儀。大略遊唐晉舊儀。又有上契丹册儀，以阻午可汗柴册禮合唐禮雜就之。又有上漢册儀，與此儀大同小異，加以上賀儀」，是以，册禮的儀式亦多達數種。

《故宮圖書集刊》3卷3期
乙七三年一

(上接65頁)

由考古學上見遼之文化圖譜四册

日本鳥居龍藏著，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刊，考鳥居氏曾著由考古學上見遼之文化一書，此其附錄之圖譜也，其圖凡三百三十八葉。

遼碑九種跋尾

孟森，載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期三卷

熱河契丹國書碑考

厲鼎煃，載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期四卷

契丹文字的历史概况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78年3期

陈　述

随着契丹文石刻的不断出土，各方面也表现了对契丹文字的关心。关于契丹文字历史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字的辨认解读，会加深我们对于历史上契丹民族的认识，进而了解历史上契丹族与汉族以及我国北方其它兄弟民族手足相依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历史文化情况的了解。本文试就以下几个方面摘要论列。

创制、颁行和使用

契丹文字自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时创制，由契丹朝廷正式公布，在境内行使。辽亡入金，仍然沿用。直到完颜璟（金章宗）明昌二年（1911）四月，经金廷规定："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同年十二月又宣布"罢契丹字"，正式命令停止使用[1]。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到西域时，约用一年时间，从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学会了契丹字，并把契丹文的《醉义歌》译为汉文。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蒙古语很近，但是元初蒙古人采用了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没有用契丹字。元朝以后，契丹文字就变成死文字了。

契丹文字是契丹族人民在长期借用汉字、熟悉汉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公布使用的当时，显然是经过某种程度的集结整理。

《辽史》中记载契丹字有大小两种。大字是"太祖时，大臣鉤鼻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3]制成的，于神册五年（1902）九月颁行[4]。又因回鹘使者来，无能通其语者，太祖命达剌接待，"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5]。制字和公布的时间，应在大字之后。看得出，大字借汉字的基础，小字受回鹘文的影响。以后女真跟着契丹的脚步，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也分大小两种：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所制的称大字[6]，天辅三年（1119）八月颁行，它是依仿汉字，因契丹字制度，合女真语制成；完颜亶（熙宗）又制女真小字，天眷元年（1138）颁发，皇统五年（1145）五月"初用御制小字"[7]，明《秘阁书目》所载《女真字母》一书，似即小字字母。

为了进一步了解契丹字的创制使用，有必要了解一些制字以前的情况。唐时，渤海靺鞨的区域政权或集团，如震国、渤海、兀惹等都曾"有文字书记"，文字均指汉字言。他们只把汉字当意义符号，用自己的语言读音。远在唐朝以前，高昌"文字亦同华夏，

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8]。他们虽然在汉文之外，另有胡书，但用本族语言读汉字是很明确的。《隋书》所记“新罗、百济有文字同于中国”[9]，也是用本族语言读汉字，当然也并不排除读汉音。有人据此就认为当时已经有一种根据汉字创造的音节文字，显然是误解《隋书》。[10]

清代琉球有地名奈村，当地人读作“苦念搭”，另一地名曰“泊”，当地呼为“土马爷”，均一字三音；又有辻山，“辻”字呼为“失汁”，一字二音；另有地名喜屋武土，当地呼之曰“腔”，只一音[11]。云南白族的白文，也是用汉字记本民族语言的。

契丹作为大唐的组成部分，建国以前，草地上的中原流人用汉字。回鹘人用回鹘字。由于中原流人（包括俘户）文化较先进，人多，接触多，契丹人也用汉字作意义符号，用契丹语读音。

大字即“增损隶书”作为表义字。主要是简化汉字，用契丹语来读。但这种文字，是一些独立符号。符号较多，其中也掺用少数的汉字，如“此”、“末”、“东”、“南”、“秋”、“冬”、“皇帝”、“太后”之类。另外，随着大字的使用颁布，还作了一批代表“诸部乡里之名”[12]的符号，也是属于大字一类的。所谓迭剌所造的小字，是参考回鹘文法则，摆脱了意义符号的框子，采用声符拚音成字，“数少而该贯”。文字口语一致，通解契丹语的人容易学习，其中也掺有个别表义字。

据《辽史》记载，参加大字创制即整理工作的，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均有赞成之功[13]，但是没有提到他们通解汉文的程度。根据“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14]“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15]，这些说法，肯定会有汉人参与其事。小字的制造，除迭剌而外，也必有襄助之人，最低在使用过程中，不可能不经过一定的补充和修改。

大小字同时使用，汉字也用。辽太祖（阿保机）能说汉话[16]，第二代的太子倍（突欲）、太宗德光均精通汉文[17]。由五代至宋，辽廷对中原的来往正式公函，地方上南北边郡移牒，一律用汉文，正本一份；对西夏、高丽的书诏，也用汉文正本一份。不仅不用契丹文，也全无契丹文副本。当时中原和契丹都有专办交涉事务的通事，如康令德、王英、陈延正、刘胤……等人，史书里记载他们均能汉语、契丹语，没有说过他们当中谁懂契丹文。《宋史·刘重进传》：“（石）晋初，以习契丹语应募使北，……（入宋）迁西头供奉官，再使契丹。”澶渊结盟时，曹利用以通契丹语应募使军前。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均未言通契丹文。

统和十三年（995）、十四年（996），高丽两次派遣童子十人，共二十人，来学本国（契丹）语，两次都未要求学习契丹文[18]。

开泰元年（1012）“归州言：其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只称文字者，一般均指汉文说，辽廷治下的契丹人，有些用汉文作的诗文集；朝廷主持下的佛经疏解，也全用汉文。汉人更是用汉文。个别的汉人有通契丹语识小简字者。

帝、后哀册，有用汉文、契丹文两种文字的，契丹贵族的墓志，有用契丹、汉两种

文字者，也有用汉文或契丹字一种文字者，但是凡契丹字志文，十之八九用汉字志篆，其汉字志文、无用契丹字作志篆者。

从以上各种情况看，在当时的社会上，契丹文的使用面不宽，就是契丹统治阶级上层，通识契丹文字的也很少。在部落里，识字的人不多，使用面更窄。加上书禁极严，晚期又不准私刊文字，因此，当年的契丹文作品，目前没有用书册卷轴保存下来的样本。女真字图书，也仅仅留下了明代的女真来文和杂字，即《女真译语》。

流传、辨认

契丹文字既已废弃不用，也没有契丹文的图书流传下来，人们只知道有契丹字，但契丹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却越来越陌生。宋王易《燕北录》著录过和“朕敕走马急”相对应的五个契丹字，陶宗仪又转载于《书史会要》卷八，由于传刻失真，已经不能当作样本看。明陈氏世善堂藏有《辨鸡录》一书，书目作者陈第（1541——1617）所作的解题：“译契丹人语”。此书和“译西夏人语”的《番尔雅》并存于四译载记类。按这个解题和部居，我们有理由推测此书是契丹文、汉文对译的，根据书名和内容判断，作者应是一位汉文修养很深的契丹人[19]。

明、清金石家著录《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碑，碑刻是两种文字对照，汉文的既称大金，另一种不识的字，很自然的就被当作女真字。明赵崡《石墨镌华》、清王昶《金石萃编》都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没有注意《辨鸡录》。汉文“天会”为金太宗年号，又表明碑文不可能是熙宗所制的女真小字，所以当作女真大字也是自然的。另一种不同于《郎君行记》字体的女真字，就被当作女真小字了。乾嘉学者钱大昕考证了碑文所称的皇弟是撒里喝[20]，但他并没有怀疑这种不认识的字非女真字。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Remusat，Wylie，Bushell，Marguart等人，在讨论女真文字时，提到过契丹文字，但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明。1898年，日本白鸟库吉根据《燕北录》、《书史会要》中的契丹字和其他相关材料，检照对比，结合文献记载的契丹语，参研研究，他也认为《郎君行记》碑的文字是女真大字，和这种[illegible]不同的《女真进士题名碑》（一说《金台圆书碑》）的字是女真小字[21]，这表明当[illegible]不仅不认识契丹大、小字，而且还仍然以契丹文字当作女真文字。

地下出土改变了契丹文字研究的面貌。确凿可信的新资料，成为契丹文字辨认研究的新起点，但前进道路还是崎岖的。

1922年，在辽宁巴林左翼旗的辽庆陵中发见契丹字哀册，当地教士抄录后，原石即不知下落。后以抄本刊布于《天主教公报》（118号，北京，1923。伯希和又转刊在当年十月号《通报》）、没有能使较多的人看到契丹字的真面目。1925年日本羽田亨根据抄本哀册的照片，提出不同以前的看法，推定《辽陵哀册》和《郎君行记》为契丹小字；《燕北录》、《书史会要》、朝鲜博物馆所藏八角镜的铭文为契丹大字[22]，实际上，八角镜铭的四个字和《燕北录》所著录的五个字不能看作属一体，而镜铭的字和辽陵字确属一体，他则没有认出来。《书史会要》虽然说到汉人陷蕃者增减隶书造成的契丹字，即大字，由于例字很少，又传刻模糊，已经无法当作样本看。

1930年当地军阀由辽陵掘出道宗及宣懿的契丹字哀册、哀盖等四石和汉文哀册，开始有拓本流传，这才吸引着人们来给它们“相面”，大家对着这些不认识的文字看，和汉字哀册比，也和《郎君行记》碑的字比较，它不仅和汉字相仿，基本上是方块形，又和《郎君行记》碑上的字有相同的。辽陵不可能有女真字，金初仍用契丹文，则《郎君行记》是契丹字就明确了。

由于道宗及宣懿哀册均有契丹字、汉字的两种，程式上表现出彼此相同的地方，如册盖、册题、纪年包括的干支、数字、年号以及皇帝、皇后等词，可以肯定或有条件猜测一些字义的，仅限于字义，不能标音解读。这种情况，反映在罗福成等人的释文中。在这一阶段，他们也都认为庆陵的字是契丹大字，同时也看出了这种字是由几个原字组成的[26]。另外曾有人假设庆陵文字是小字，也止于猜测。文献里用汉字保留下来的契丹语不多，准确率也差，不能严密地和契丹文字对口径。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不能完全离开语言谈文字。关于契丹语言的情况，汉文记载里保存了一条有趣的事例：

契丹小儿初读（汉文）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27]。

这个事例，揭举了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一、契丹语法构造，至少在语序上与汉语不同，和蒙古语一致。它印证了拉施特所记的“契丹、蒙古语言多相类”，[25]也和近年的调查研究相符[26]，这就直接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契丹人读汉文是以汉文作义符，用契丹语来读，和高昌、渤海基本上一样[27]。

这两点对于我们理解契丹文字是很重要的。这个事例和它的意义，在罗福成等当时的解释辨认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六、小字的识别问题

在抗战期间，1939年，东北沦陷区沈阳出土了《故太师铭石纪》，碑额汉字，碑文非汉字，呈方块形，笔画较庆陵字简少，有人认为是契丹小字，也有人说是伪造的[28]。当时留下一分模糊不清的拓本，原石已不知下落。

旧社会考古工作和历史文物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盗劫，给契丹文字历史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解放后随着更多的契丹文字先后出土，促进了这一研究工作。1951年辽宁锦西西孤山辽墓中出土契丹文汉文墓志，其契丹字与辽陵字不同，与《故太师铭石记》一致。它确凿地说明了《故太师铭石记》不是伪造的，而是另一种契丹字。文献记载契丹有大、小字，现在已经有两种契丹字出土，同作汉字笔画、同呈方块形，也都和汉文一样的顺行，由上而下，由右而左。这就对于辨认解读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哪一种是大字？哪一种是小字？

根据构造的情况，文献里留下了两条标准：

一、大字是增损汉字而成的，小字是受回鹘字影响的；二、大字约有单字三千多，

小字数少而该贯。

大家都是按照以上的标准来考虑，但理解不同。有人主张庆陵字是大字，锦西字是小字[29]。也有些人的意见恰恰相反[30]。识别标准虽相同，但由于各自不同的理解，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论点。彼此都能自圆其说，也还都未能用充分理由说服对方。

我们也曾设想过，会不会有一种契丹字，用回鹘字母记契丹语，但是没有找到值得追寻的线索。那么，究竟怎样判断大、小字？

按照两条标准，结合相关的史事，比验两种字体的特点，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一、从两种字体本身看

锦西字一般的笔划少，不易拆散，一个单字构成一个符号，主要属于义符之类，应是大字。

庆陵字一般的笔画多，绝大多数单字是由几个符号构成的，易于拆散，应属声符之类，最关键的一点，庆陵字的组成，往往是同字，有各种不同的字尾变化，这种组合方法和回鹘文一致，所以庆陵字应是小字。

二、从受汉字影响看

锦西字有以下几个较突出的特点：（一）直接借用汉字，如一、二、三、五、十、廿、百、日、月、皇帝、太后、殿……看得出这些字不仅借汉义，有的可能还读汉音；（二）汉字在锦西字中的比例《太祖陵墓残石》约占5／26《萧孝忠墓志》约占57／500；（三）增损汉字的痕迹较明显，如马（马）旱（牛）忝（天）等。

耶律蒲鲁“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31]大字和汉字距离近，锦西字应是大字。

庆陵字虽受汉字很大影响，但基本上是用音符表达契丹语，郑恪“通契丹语，识小篆字”[32]。通语言对识小字成为比较便利的条件。因为是声符标音，更适宜韵语，诗歌、册铭都压韵，这在庆陵册铭的韵脚看来较明显，庆陵字应是小字。

三、从女真字来看

女真字原有大、小字两种，现在传世的只有一种，它本身也发生是大是小的问题。[illegible]记录里留下了帮助判断的线索。

《金史·完颜希尹传》称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女真）语[illegible]”（完颜勗传略同）

希尹所制的是女真大字，即先作的称大字，它和汉字契丹大字一线相承。另一种即后作的称小字，则和汉字契丹大字关系较远。现在女真文字虽只有一种传世，但它呈现了沿承汉字、锦西字的特征。如下表：

类别	例字							
汉字	二	三	十	年	月	日	天	
锦西字	二	三	十	𢎘	月	日	𠀉	
女真字	𠂇	𠂆	十	𢎘	月	日	𠀉	
庆陵字	𠀉	包	乞	丰	女	𡿨	𡿪	

现有的女真字接近锦西字、汉字，庆陵字显然和它不同，另属一系，即契丹小字。

金政府在各路设女真字学，专课大字。完颜兀不喝即学过女真字学，做官以后，“再学小字”[33]。官方以大字为主，使用较多，仅得流传，现在传世的女真字可以认作是女真大字。因而与之相近的锦西字可以认作是契丹大字。

以上分析了契丹大、小字，只是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即是否大、小字混合使用的问题。

山路广明主张：“独体是大字，复文是小字，把几个大字合在一起，可以构成如小字一样的字使用。”这属于罗福成那种设想的一个申引。实际是大、小字不分，按照他的说法：“大字是表音又表意，小字则只用于表音。”在一篇文章里，大、小字并用，如宣懿皇后哀册中，有**几乞毛女山**等五十余字是大字，其余属小字。在《道宗哀册》、《郎君行记》中均有若干大字掺在小字当中[34]。（田村实造也有类似的意见[35]）这等于变相否认大、小字的区别，实际上是说不通的。根据我们反复查对，小字符号有的和大字相同，也用义符的读音作音符，但不等于两种字混用。历史记载，有些人是专识一种文字的。事实上，和**丰**、**乞**、**毛**、艾等小字意义相同的大字，并不是这样写法。有的大字、小字同形者，音、义并不同。

例字	大字	小字	备注
安	龙（音义）	an 音符	
奚	大（音？义）	an表示所有格	
丙	丙（音义）	音么、牧、母也	丙即汉文丽字

也有人把契丹、女真文字合并起来说，他认为：“两种契丹字均为女真借用并被女真人作了某些改动。”他说：“《奴儿干碑》的女真字是音节文字和象形文字，不属于拚音文字，不可能是小字。因之，契丹女真文字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小字。”[36]在这里他虽然提到了大小字的差别，但把契丹、女真字混淆起来，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而他的主要意见也是错误的。

女真人参考契丹字制字，彼此有联系，有区别，不是搬过来使用，不是两者等同。只说《奴儿干碑》的字是大字，似乎还不知道契丹字中另有锦西字一体，他以庆陵字作契丹小字，以《郎君行记》碑作女真小字，则是完全忽视了天会年间不可能有女真小字这一历史事实，因为天会十二年还是太宗当朝，熙宗继位后四年（天眷元年，即1138年）才颁女真小字，再后七八年（皇统五年，即1145年）才“初用御制小字”。应当申明，我们并不完全排除先有使用女真字的可能性，但这须由文字本身来决定，在未能证明它所代表的是女真语以前，我们只能承认它是契丹字。

现有资料和解读

契丹文现存的资料很少，尤其是没有任何对译的书籍可查。关于大字的资料现在主要有：锦西西孤山出土的《萧孝忠墓志》（大安五年），《故太师铭石记》（重熙二十

五年），两者拓本均不够清晰。前者有汉文志文，但不是两两相对的直译，后者还没有汉文志文；近年又有统和四年《耶律延宁墓志》和重熙十年《北大王墓志》出土。还有一块出土情况不明的大字碑，另辽太祖陵墓残石上有二十余字。《大静安寺碑》碑阴有契丹字片断（咸雍八年），属于这一体[37]，但大部已模糊不清，连续成文者不多。此外见于器物铭刻者有辽宁建平县朱碌科乡出土的银匕、张家营子出土的银碟和黑龙江阿城县文管所保存的铜牌上的几个字，可拟为锦西字，即大字。阜新县西山村出土的铜铙上的几个字，是否契丹字，还有不同意见。[38]由于有锦西字作样板，旧日认为属于女真文的铜印，现在也可拟为锦西字。近年各地也有属于这一字体的铜印出土。另外还有少数几个字，只能在其它材料出现相应的文字时，才可以作参考比较。

关于小字现存的资料主要有：一、兴宗哀册（清宁元年即1055年）抄本；二、义县出土的萧公墓志残石（清宁三年即1057年）拓本，有汉文残文；三、仁懿皇后哀册（大康二年，即1076年），有汉字册文均为抄本；四、道宗哀册（乾统元年即1101年），有汉字册文；五、宣懿皇后哀册（乾统元年即1101年），有汉字册文；六、许王墓志（乾统元年即1101年），有汉字残文（志盖有六个对译的字）；七、故耶律氏铭石（天庆五年即1115年）；八、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金天会十二年即1134年）有汉字译文，；九、梓木林子出土的萧仲恭墓志（金天德二年即1150年）。

此外还有铜镜铭文、鱼符和庆陵壁画人物肩上及其他墓葬出土的一些墨写的契丹字，和册文是同一体式的。另有见于玉杯、砚、砖等器物铭刻的零星的小字均无译文，出土情况不明。有的现在还不能判定真假，可以在大部分小字通读后作为参考。

我国北方民族的几种古老文字，如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女真文都有字书译语可供参考。只有契丹文，没有任何直接对译的书籍可查。惟一的一部《辨地录》，尚待寻访。《辽史》所存汉字记音的契丹语很少，确切可信的契丹文、汉文对照的完整材料，大字只有墓志两种；小字主要是两件册文和碑记一段。字字对译的不多，不能有效地帮助解读。所以从契丹字出土以来，对于通训定声的工作，仍在探讨阶段。由于历史上留下的凭借很薄弱，我们的解读虽然付出了较多的劳力，结果仍然是试探性的，初步[illegible]还应在解读实践中，反复验证扩大认识范围。

[illegible]由于对契丹民族历史的了解不够，就是利用对照关系比出的干支、年月，也读不出音来。

近年，通过汉字记录的契丹语和历史上的若干制度，传统习俗以及语言、考古方面的研究，可以试探契丹字的通训定声，使研究辨认向前迈进了一步。

对大字的解读，根据它采用汉字的比例看，应有部分是保留汉音的如“太付太太”、“皇帝”这类字，很大可能是汉义汉音的；“秋”“冬”肯定是汉义，但不一定是汉音，“天”汉义天，似应音读“腾格里”，也不排除有时会读“天”。

小字除部分借用的语词而外，一般说是契丹语，但解读工作仍然是比较复杂的，由于没有字书诠解，需要广泛的历史知识帮助缩小音义的范围[39]。也需要一定的语言音韵知识帮助比较。

凡求读音者，都是把契丹小字的组成部分拆开，寻求音值，但彼此读音的差距很大，如相当于元年这个“元”字的契丹小字，“尤安”，有人主张：尤安即汉字尤与安，尤安切

音即元[40]，有人主张：尤＝o，**夾**＝ki **尤夾**读oki，蒙古语第一的意思[41]。又有人主尤读na，**夾**读i nai蒙古语第一的意思。[42]也有人以尤当汉字元；**夾**读da表示序数的语尾[43]。

按《元朝秘史》卷二、卷三、卷七所记“夏的头月的”（即四月）“头”字的蒙文均作“帖里温”。又《华夷译语》“冬的头月的”（即十月）“头”字的蒙文作“赫乞”。中世蒙古语接近契丹语，似以“帖里温”、“赫乞”较合适。

元年为某一年号的头一年，纪年用年号为中原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则尤安切音为元之解亦可取。

“**尤夾**”字是意义明确没有争论的。至于意义不够稳定的字那就差别更大了，但也有彼此相近相同者，如契丹原字“**𗼇**”，除个别人之外，大家一致读音l、la，可见也不是完全漫无标准，也可看作是偶合或沿用。

在契丹大字里，元年的元作“尖”，相当于元字意义的第一，开头的，头一个，在蒙古语里有angha，tulgur，togtom，manglai也有开头的意思。中世蒙古语的“帖里温”具有类似的意义。在没有多方测验之前，我们不便遽作去取。但是从“**尤夾**”字读音的不同意见看，显然有两种试探办法：

一、用蒙古语、契丹语解读；二、用汉语汉文解读。

当然这两种试探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要相互参照，要殊途同归。汉语借词可以回译汉语；汉字所记契丹语言，对解读来说，应当比现代蒙语和中世纪蒙语更值得参考。如契丹语“墨离”（马），蒙语读“墨林”，可以看作是同一语；契丹语“末肌”，中世蒙语读“蔑惕”，也有前后相承的痕迹。但另一方面，契丹小字的原字“**屮**”〔ben〕显然是截取汉字本的下半段。**屮**在合成字中也作“**𗼇爻**”、“**𗼇伏**”，则“**𗼇**”〔B〕爻〔en〕伏〔en〕之音可读。进而求之，契丹字也有与汉字汉语及回鹘字回鹘语相通者，如年月的“月”，回鹘语读ai（见《高昌译语》），契丹大字写作“月”，契丹小字写作“**艾**”，音读ai，在另外的组合中也读iue。

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记录，认识了契丹、蒙古语都有译文重叠用字例，如合利郎君或合利王子之类，交互比验，认识了契丹原字加“、”有同有异；我们通过上下文的解读辨识，认出了基数加“、”成序数，举一反三，连类可辨。详见第三篇解读释例。因而“**𘰾山主王**”（天汗皇帝）之义遂得通解。[44]契丹大字“**马**”（马）与汉字的马差不多。契丹小字马作“**𘰾化**”，读muri，“又”和回鹘字母的m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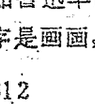
以上情况为我们提示了解读的某些渠道。当然还要通过一段交互验证，最后的通训定声，必须反复参证勘合，才能确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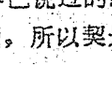
契丹文字和汉字的渊源

从对大小字各方面的考查，已经看到大、小字和汉字的关联。大字和汉字的关系较明显，主要是增减笔画。汉字属义符，构成的法则是六书，大字接受汉字传统，当然也不是不表音。六书中的谐声，已接近音符。正如鲁迅早已说过的：“这（谐声）已经是记音了……然而那基础还是画画儿”[45]正因为汉字是画画，所以契丹大字也就随着摆在义符范畴了。

大字和汉字的关系还表现在直接借用汉字上。这些被借用了的汉字，最低有一部分还读汉音。太祖陵墓残石是代表辽初大字的。汉字竟占19／100，这个比例很值得重视。在契丹字颁行之前，契丹人使用汉字，以契丹语读音；有了契丹字之后，就直接用契丹字表达契丹语。

小字是在已有大字的基础上出现的，两种字同时并行，小字参考了回鹘字法则，又参考六书，也吸收了大字可吸收的部分（有的字也有因袭痕迹），最低在使用过程中会这样做，当然这不意味着掺合不分。小字对大字是一种提高，比大字前进些。首先是音符，容易学习掌握。小字受回鹘字影响，但是并没有因此就舍开汉字，相反的，由于文字向严密完善或规范美观发展，出现语文距离，语文距离和契丹字、汉字的距离，适成反比例。契丹字逐步接近汉字，这反映农牧结合之后，契丹、汉族日益密切的关系。这种接近汉文的新文字，主要记录契丹语言在草原上使用。同时成为沟通农区牧区，传播中原文化的得力工具。契丹语的某些语词，在大字里径自借用汉字，小字则更多的采用译音。汉文“孝”字，曾以原形在大字中出现（见《故太师铭石记》第36行）。契丹小字则作：



音“赤实得本”。也作：

汉字对大字有直接影响，对小字则有直接间接的双重影响。渊源相承很明显。汉文“天”字，经常使用的有两个意义：一是天地的天，即苍天；一是一天一夜，今天明天表明日子的。契丹大字苍天的天作“**𘰾**”，日子的天作“日”；契丹小字改动字形，天地的天改成“**𗼇**”，日子的天改成“**𗼇**”。

契丹大字“**𘰾**”和契丹小字“**𗼇**”，两者字形虽不同，但同源于汉字“天”。“二”、“五”这两个汉文数字，契丹大字同汉字；小字也作了改动。汉字“二”在构成法则上属于指事，契丹小字“**𗼇**”（即数字二）不管是音素音节或谐声会意，但它呈现了“**又上**”的体形。契丹小字**丰**（年）和**戊**（五）显然是直接来自汉文的草书行书。

汉字中有些由左右组成的字，如峰、桃、经，可以写成上下的形式如、、。契丹小字也有这种写法如**角当**（面）写作（《仁懿哀册》第24行），**六爷**（地）写作（《仁懿哀册》第18行）。汉文**隼**（雀）字繁、简、全异，汉文猎、猷，音义同。其他左右互换的如够、夠，鄉、郷之类，契丹小字是否也有类似的，我们正在查对。

汉文中，重叠字的写法，有两字重写的，也有在重文的第一字下加“〻”符号的，契丹小字也用这两种方法。这许多现象都提供了契丹文字和汉字的渊源联系。

通过契丹大、小字读音造型和行文方面的分析，看得出，它跟汉字、汉文的渊源以及契丹、汉人在文化上手足相依的关系，直接反映了我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整体，不论通过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或彼此通用的语言文字，所表现的手足相依的联系是一致的。各民族人民这种凝一无间的心理状态成为我们长期来分不开、割不断，各民族团结的历史基础。

辽金时期，契丹大、小字在我国北方使用时间比较长，使用面虽不宽，但通过契丹文翻译，曾经把中原的医学、历史、文化传播到草地。也用契丹文字写出过各门类各种

体裁的作品，成为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今天虽然没有保存下原文，但它的影响，已经散布在祖国文化的各部门，并成为不可分解的因素了。1964年9月塔斯社就借报道契丹文字歪曲中国历史，胡说契丹人是中国的征服者，契丹人不是中国人。竟不看俄文拼写中国的字母正是[redacted]即契丹，真可谓睁着眼睛说瞎话。

注释：

1.《金史·章宗纪》。《金文最》卷百〇八元好问撰《耶律公（履）神道碑》："寻辟国史院书写，素善契丹大、小字，译经润文，皆辞达而理得。大定初……世宗锐意经籍，诏以小字译唐史，成则别以女直字传之，以便观览。公……独主其事。书上，大蒙赏异。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改置经书所，径以女直字译汉文。"

2.《辽文汇》卷十。《湛然文集》卷八。

3.《五代会要》二九。

4.《辽史·太祖纪》

5.《辽史·皇子表》

6.《金史·完颜希尹传》

7.《金史·熙宗纪》

8.《周书·高昌传》

9.《隋书·东夷传》

10.N.札哈洛夫《满俄字典序言》：A·H·卢道夫也因不谙汉文沿误（《契丹文字问题》刊于苏联《民族学杂志》1963年1月号）。

11.奕赓《括谈》卷下。

12.《辽史·耶律庶箴传》。石刻中出现的[redacted]这类作为姓名用的字，是否契丹字，还须更多的发现。在比较中，才能定下来。

13.《辽史·耶律突吕不传》，《辽史·耶律鲁不古传》。

14.《五代会要》卷二九。

15.《新五代史》卷七二。

16.姚坤《奉使录》。

17.《辽史·赵延寿传》，《通鉴二八六·后汉纪一》。

18.《辽史·圣宗纪》。

19.明万历间，连江陈第居蓟镇十年，"所至市书不遗余力"，子孙世守。至清乾隆初年，陈氏藏书始散落。此书是否已完全散佚无存，不能断定，我们还应当作些搜访工作。

20.《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十八。

21.《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刊于日本《史学杂志》第九编11、12号。

22.《关于契丹文字的新材料》，刊于《史林》十卷一号。

23.叶昌炽《语石》卷八已经提到契丹字是由几个原字组成的。罗福成曾疑册盖篆书分写者为大字，册文楷书合在一起的为小字。王静如、厉鼎奎认出册盖册文是相同的，均是契丹大字。

24.洪迈《夷坚志》丙志十八。

25.自冯译多桑《蒙古史》转引。

26.参格根等《达斡尔、鄂伦春材料》。又L.Hambis论契丹语是Proto Mongolian，见Journal Asiatique1953年第二号。

27.日本人在翻印汉文古籍时，一般的均在汉文左侧加上颠倒顺序的符号，在右边或下面加上标示语尾助动词或助词的假名，就是为了用日语读。

28.李文信：《故太师铭石记研究》，油印本，1942年。

29.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刊于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30.金光平等考订，见阎文附录。又《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二期。

31.《辽史·耶律庶成·附蒲鲁传》。

32.《辽文汇续编》。阎文称："从小简字的含义就说明了契丹小字的笔画是比契丹大字简单。"锦西字比庆陵字笔画简单，从而证明锦西字是小字。对方没有触及小简字问题，双方也都没有提到字尾变化。我们认为小简字可能不是指的现存志册中的契丹小字，我们怀疑现存志册中的契丹小字为文言的规范用字。小简字或许是一种简便写法。

33.《金史·完颜兀不喝传》。

34.山路广明：《契丹语研究》1951年油印本。

35.《庆陵》1953年。1976年田村在《东洋史研究》三十五卷三号撰《契丹文字考》仍持大、小字混用说。

36.Э·В·沙甫库诺夫《关于契丹女真文字解读问题》刊于苏联《东方题铭学》十五期（1963年）

37.园田一龟：《满洲金石志稿》。山下泰藏曾刊布此碑部分契丹大字，见《满蒙》第十六年十期。

38.我们现在认它不是契丹字；假当把它看作是契丹字，那还须要有其他材料作比较。

39.如契丹小字铜鱼符，鱼头上的"同"字，爱宕松男认为是契丹字，解作"神"，读作suru。谓是huru的结合体。按鱼符之制，始于隋唐（即后魏以来的传符）鱼符均有"同"字在颔下、辽代沿[illegible]传统，[illegible]字，为了[illegible]民族色彩，符身用契丹字，即两种字[illegible]使用的。把汉字当契丹字[illegible]是不合适。但判断此是汉字、契丹字两种，不全是契丹字，必须知道隋唐以来的鱼符制度，才能作最后的确切判定。

40.山路广明：《契丹语研究》，油印本。

41.爱宕松男：《契丹文字解读》，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学报》第七号，1956。

42.В.С.达斯金：《契丹文字试读》，见苏联《亚非民族》第1期，1963年。

43.Э.В.沙甫库诺夫：《契丹女真文字解读问题》。

44.这里所举的例子是在本文以前尚未接触到的。由于译文重叠用字例，我们可以判断**而讨亚伞门劣太**（许18）是义符音符重叠。加注"楚古"，未合。楚古是审讯官，犹之现代的"丞审"，都统是统领兵马的高级军官。

原字总数按我们初步整理宽算也不到300个，不是378个。

45.鲁迅：《门外文谈》。